

## 生活型式分析的产生

首先我简要介绍一下生活型式理论 (life mode theory) 产生和发展的学科背景。在丹麦我们将研究生活型式的学科称为“民族学”<sup>1</sup>。民族学 (Ethno-Logos) 是一门研究人类族群如何生活及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如何发展演变的科学。人类生活是一个周期性的过程, 具有整体性的结构特征, 于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就会有特定的周期循环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学与生物学具有可比性。”bios”<sup>2</sup> 在古希腊的哲学术语中指生活型式, Bio-Logos 也成了一门研究所有自然生命形式的科学。如果我们在现代语境中比较这两门学科的话, 大家都知道生物学研究的是关系, 过程和系统——自从达尔文与生物学的传统认识论决裂后 (确立了适者生存原则的三个维度: 遗传, 变异和自然选择), 生物学在理论上的研究对象就成了生态系统——也即生物间弱肉强食的代谢链, 或者各种生命形式在生存斗争中的共生或竞争关系。新陈代谢过程中的这种关系决定了在一个具体特定的生态系统中哪一种生命形式可以存在; 而民族学则探索不同的文化生活型式对于劳动力的分工和使用, 在一个特定社会系统中这些文化生活型式相互确认、相互对立并互为前提 (Højrup 2002, 2003: 10ff)。

生物学致力于探究所有可能的生命形式, 赋予其最为详尽的概念和解释; 而民族学则以探究所有可能的生活型式为己任, 对围绕着它们所产生的各种概念进行系统的阐述和说明。生态系统中生命形式的存亡取决于生存斗争中的自然选择过程; 而社会系统中的生活型式的演进则取决于在为承认而斗争<sup>3</sup> 中发生的选择过程; 生物性的生命形式通过新陈代谢来再生, 而文化生活型式则通过承认, 生产和分配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自我复制; 生物性的生态系统理论以适者生存原则为基础, 而民族学的国家系统理论 (本文中所要探讨的) 则禀持着国防强则国家存的观念。这两套理论体系都涉及相互联系又相互对立的生命形式之间的共存与转化。当生物进化理论以自然历史为研究对象时, 作为文化进化理论的民族学则以生活型式和国家形式的文化演进史为研究对象。(Højrup 2002a, 2003: 221f, 2008)。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民族学的生活型式分析总是要求做出一种描述, 描述被研究的生活型式在其不断超越自我的文化历史进程中, 它的各种特征发生了怎样的演变。由于民族学明确描述了相关的合逻辑的生活型式, 它其实是富于启示的民族志; 由于民族志要求描述生活型式中可以观察到的特征 (在基本理论的指引下这些特征会体现出来), 它其实是充满活力的民族学。民族志以一种共时性和历时性 (生活型式的特征在时间上的共存性和连续性) 的方式来描述生活型式, 民族学则企图在理论上探讨生活型式的诸种特征的共时性和连续性如何在一个非时间性的理论谱系中相互依存并互为前提。民族志中的现实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描述的历史进程作为背景, 在此背景下我们所研究的型式得以产生, 所以民族志式的生活型式研究的对象是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型式存在的必要条件之间相互支配的关系结构决定和影响着生活型式的集合, 并且对于国家的政治, 司法, 意识形态和经济结构提出互相矛盾的要求。当我们分

---

<sup>1</sup> 民族学: 即 Ethnology, 词根 Ethno 指民族, 而 logo 指科学, Ethnology 曾经也译为“人种学”或“种族学”, 后来这种译法因被指具有种族歧视意味而逐渐被取代。这里强调丹麦是为了区别于欧美其它国家使用的学科名人类学

(anthropology)。在丹麦民族学则作为人类学的前身沿用至今。英国的“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美国的“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 和当前合称的“社会文化人类学”(Sociocultural Anthropology), 在研究对象和范围上与民族学相近。——译者注

<sup>2</sup> Bios: 生物学 biology 的词根

<sup>3</sup> 此处的“为承认而斗争”最初源自于黑格尔, 主体处在“为承认而斗争”的自然伦理生活中。这些斗争的目标是寻求主体人格的完整性。这一框架后被德国著名的社会理论家阿克塞尔·霍耐特 (Axel Honneth) 所发展。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核心人物的霍耐特在早期黑格尔承认学说和米德社会心理学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完善的承认—蔑视理论。在其于 1995 年出版的代表作《为承认而斗争》中借助于 G.H. Mead, D.W. Winnicott, T.H. Marshall 等人的社会心理学和法律社会学研究, 从规范视角对爱、法律和共同体意识等三种承认模式做出了集成性的解释。

析生活型式的文化历史时，我们就是要努力发掘这种决定和影响如何发挥其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说，民族志把握了这样一个过程，即某些生活型式因为失去自身存在的必要条件而从某些特定国家的社会形成过程中消失，同时新的生活型式由于其存在条件成为该国的统治要素得以改善而在这个国家发展起来。这样一种支配关系决定了相互冲突中的存在条件怎样在一个国家的社会形成过程中共存。这种共存意味着某些生活型式的离场的新的生活形式的登场。(Højrup 2003: 16ff, 127ff, Højrup 2011, Højrup & Schriewer 2012: 70ff, Høst 2013).

## 对生活型式分析的一种形式的详细说明

丹麦关于现代生活型式的早期文献在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当时欧洲北部的国家为谋求政治利益有意对曾专属于国家规划管理的实体规划进行分权(Højrup 1983)。为促进国家机器的结构合理化，实体规划权被分配到地区级别及地方级别。其中的一个新举措就是邀请公民们加入到规划过程中来。此时新型高效的潮流就是要在规划过程听取不同群体的意愿和需要——不论是文化的，社会的还是产业的要求——广纳各界意见，以改善规划过程和结果的效能和可持续性。

把家庭农场主，专业人员，个体户渔民，工资劳动者，公务员，家庭主妇，投资者，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首次联合到一个规划过程中来，这是个相当困难的任务。应该在哪建公路，在哪建新医院和新住宿区，应该关闭哪里的工业区又在哪儿建新的等等这些都是问题。要大家有意识的加入到这样一个充满矛盾和反思的过程中来承担责任并发挥切实作用是很不容易的。通常规划者要介绍不同的规划模型和方案所支持的不同愿景，但是这并不是总能得到所有市民的理解。

这种规划过程凸显了不同群体之间在需求和意愿方面确实具体可见的冲突。鉴于此，当局认为这时候民族学家也许能派上用场，能帮助规划者、政客和当局体察不同的群体如何构想自身的需求和意愿，如何理解规划过程和规划会议。那时我还是个学生，被邀请参加丹麦规划研究院的一个调研项目。该项目旨在对不同群体的生活方式作出描述，以促进规划过程的顺利完成。(Højrup 2003: 13ff).

一般人可能会以为用日常生活的观念来描述当代人的生活方式是个很轻松的任务。我们对欧洲福利国家的现代日常生活都有一个基本印象，但是这种总体观念的弊端在于它预设了一种大体上一致的生活模式，所以无法用它去理解人们在规划过程中表达特定意愿和需求时的不同的背景、它们之间的差别和利益的分野点。这种总体观念假想出的人类需求和预设出的现代一般规范无法指引规划者去理解文化冲突，而文化冲突对于规划过程来说又举足轻重。正因为如此，民族学才被引进来替代这种总体观念。在 1970 年代这种替代表现在作为质询或想象对象的日常生活这一概念的解体，这种解体主要是通过社会行动理论的一系列论述完成的。

这种理论的基本模型认为人们的生活方式可以被理解成每个人都在将某些文化价值最大化。人们对他们的家庭，工作，邻居，住房，教育，景观，本地社区，城市等等拥有各自不同的评价。他们的评价反映了他们的价值体系。在被文化配备了这样一套价值观之后，“行动者”采取怎样的行动来最大化其文化价值取决于他所拥有的资源。所以当民族学家了解了人们的价值体系和拥有的资源时，就应该可以对人们的行动方式作出解释。由于每个人都在最大化他或她的价值，因此行动应是可以透过考量人们的价值体系和资源来进行说明的。(Højrup 2003: 91ff)。

论证的第二步提出如果两个行动者的行动相互联系，那么他们就是在互动。两个人各有一套价值观和资源，在此基础上两个相互交流自己的价值。在这个互动的概念中，交流是核心。互动论者在这一概念的基础上引入了社会规范。在这一准则下，各有一套价值体系的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就成为他们逐步了解对方价

价值观的过程。这种学习过程对双方的价值观都构成了一种反馈作用，其结果就是双方价值观的融合。社会规范的形成基于这样一个观点：互动越多，融合越多。一国之内或多国之间的人互动的越多，则文化的相互融合越多。

以这种互动论的分析模式为基础，民族学家和社会人类学家可以告诉规划者描绘出既定群体的价值观是多么重要。作为这种描绘的背景，民族学家还会告诉他们不同的价值是如何在群体中散播的，如何对其加以利用以便解释为什么规划过程中大家众口难调。但是有经验的规划者向研究者们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他们说：“如果你有这么多不同的价值观，而日常生活的概念又已经崩塌了，那我们就要问你们一个新问题了。这个新问题就是，这些价值体系的区别里面哪一部分对我们规划者来说是需要反思的呢？总不能一个规划里面纳入无穷无尽的，或是一大堆错综复杂的价值观啊。”

一个规划过程必须考虑到所有必然的区别，这些区别不止会因为互动而发生变化。有些文化特征如果不纳入考虑范围就会对于规划实施有所妨害。在规划过程中把它们挖掘出来，这是规划实施者对于民族学分析最根本的要求，满足这种需要也是民族学分析的重要特征。必然的区别是指那些不会因为日常生活中永无止境的互动过程而发生变化的区别。于是下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可能揭示出那些更加持久，牢固且深刻地植根于所谓的社会结构中的特定区别？有没有某些文化形式既依赖根本的社会结构且又为特定国家的社会形态的根本结构的形成提供基础？这么说吧，有没有哪些文化形式可算是特定的国家和社会形成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Højrup 2003:16ff)

要回答以上问题光靠功能主义和社会行动理论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借助于文化概念，这些概念的基础是对于必然的生存方式的理解，这些生存方式是可以再生产其生存条件的。某些可能的生存方式是相关的国家形式和特定种类的社会的基本结构形成的必要条件，我们的任务就是从理论上阐明这些生存方式。那么，怎样才能构想出这种理论并给予其经验上的阐述呢？这时再生产，耐久性和存在的问题就被引入进来了。

欧洲思维中的一个重要的传统观念就是从这种再生产的角度生发出来的，这个观念就是实践的观念。该观念作为一种理论工具被组织起来，旨在说明特定的可能性条件下实践如何再生产其自身的存在条件。我们知道这种思路演化出很多变体，而且这种思路指向的事实是，实践必须具有循环性，因为只有这样生存方式才可能构成生活，成为社会形成中不断自我复制的要素/过程。这种分析模式的变体之一就是生产方式的概念。在此概念下，一国的经济文化可以被看成是由一系列独特的自我生产和占有过程的形式组成的，这是它与传统分析模式的分野之处。

这个理论最初的问题是：在 70 年代，这些不同的生产方式被认为是由社会阶级组成的，而不同的阶级有其特定的，甚至是相反的利益诉求，它们之间相互冲突。但是如果一个阶级被看成是众多具有共同利益的个人的组合，那么我们还是需要一个（分类上的）概念，而且这个概念中行动者既是思考的主要承担者，又是特定利益的代表。如果说这些利益上的差别是由行动者的物质资源造成的，那么如果资源发生了变化，则根本利益也会自动发生变化(Højrup 2003: 121ff)。

如果从这种角度去理解阶级的话，我们就无法用它来解决我们在规划过程中及民族学分析中遇到的问题；对我们工作更有指导作用的是生产方式理论的另一个全然不同的层面。我们发现可以利用生产方式的概念提出以下问题：哪些必然的生活型式是具有自我复制能力的独特生产方式存在的前提？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成为从理论上建构和经验上理解丹麦社会各种根本的文化形式的关键。为了描绘一系列的生活型式和它们存在的条件，我们把生产方式的概念看作一个关系结构，它以一系列特定的生活型式概念作为这些关系结构的终点，终端和类别。我们来看一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它的特点就是有三对互为必要条件的相

互关系。要讨论工作和薪酬之间的相互关系，就不能不讨论决定二者内容的另一个相关因素，即工资率。这种相互关系预设了这样一个前提，即工资率由劳动力的买卖双方面的谈判决定。有劳动力市场，就有资本市场。而在资本市场中可以获得资本并通过投资获利。获得利润的前提是拥有剩余价值，而剩余价值的生产又以劳动力市场为前提。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互为前提，相互关联。经过进一步的专业化以后，不同的公司和投资者之间相互竞争，他们都必须努力在生产效率方面打败自己的竞争对手，努力开发出新产品，走新路子去营销自己的商品，为公司在市场上赢得暂时的垄断权，以便获得利润。为了做到这些，公司必须购买专业经验。提供专业帮助的“专业人员”泛泛说来就是拥有独创能力的人，正是他们独特的新创意使得公司领先其竞争者，在市场中生存下来，并创造出剩余价值，把超额利润支付给投资者。借助这些利润他们才能在资本主义的竞争增强竞争力，购买更多的劳动力，卖出更多商品，产生更多利润，如此反复(Højrup 2003: 144f)。

这种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过程包含了三种不同的生活型式，每一种以其特定的方式为整体的生产方式作出必要的工作或提供必要的参与。资本主义模式与商品市场相关，在商品市场上的农业，渔业、服务业、软件制造业和贸易中的个体经营者组建的小企业都在营销他们的商品和服务，他们不需要外来投资；他们投入巨大的精力去自主创新，也不从专业人员那里获得专业意见，而且他们自己也尽可能多的加入到体力劳动中。这种模式称为简单再生产，其中生产者通过家庭实现个体经营的生活型式(Højrup 2003: 138ff)。在社会形成初期的专业化过程中，一个整体的经济过程中包含了四种生活型式：个体经营者、投资者、专业人员以及工资劳动者。正如生态系统中的自然生命形式互相依赖互相联系一样，社会构成中不同的文化生命型式也在相互对立，相互依存。

顺着这个思路我们得出了一个必然律：对于建立在以上两种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社会构成，上述四种生活型式缺一不可。这些文化生活型式不会仅仅因为互动而发展或消失（像社会行动理论），它们的根基更牢固。它们依赖于社会构成，而社会构成也依赖于它们。正因为如此，对各种生活模式的存在条件做出说明是可能的。这四种生活型式的所有变体也设定了明确的前提，使得对于它们的描绘也成为可能，因而可以从民族学的意义上对它们进行探究，以民族学的思路去解释。我们看一下工资劳动者的生活型式：它存在的基本经济条件是劳动力市场。从逻辑上讲劳动力市场是工资劳动者的生活型式存在的必要条件，因为工资和出卖工时的概念已经包含了劳动力市场的概念。劳动力市场又取决于政治和司法的可能性条件，因为财产、合同和工资率的概念已经牵涉其中。这三个概念指向宪制国家的政治关系理念和作为一种特定意识形态关系的法制观念。这些观念存在的可能性条件是主权领土和国防模式观念的存在，而主权领土和国防模式观念一旦存在，为了承认而斗争的观念以及国家系统的观念也就包含在内了。从民族志的意义上讲，我们对于这个民族学先决条件的链条的现实体验可能是工人们参与到游行示威中，要求国家保护国内劳动力市场，抵抗入侵者和非法移民抢他们的工作或拉低他们的工资。

针对特定生活型式按照这种形式来进行专业分析，就是对生活型式存在下去的可能性条件和必要条件的探究。以研究今天的西班牙某类工资劳动者生活型式的变体为例：也许游行的人们在表达对于某些必要先决条件的要求，也许不是。对于规划者和工会，雇主，乃至地区和国家的规划过程而言，能够在必然的要求和无关特定生存方式必要条件的修辞性的话语要求之间作出区分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也可以按照同样的方式去研究投资者生活型式存在的可能性条件。投资者的生活型式的预设前提是金融市场，它包含了资本市场的各种特定关系。资本市场本身对于司法系统，权责划分具有非常明确的要求(Høst 2013)。我们都知道要想在俄国引入资本市场很难不滋生出经济黑手党、野蛮资本主义和寡头政治等等。正是由于这种法制生存条件，政治家们很难在短期之内建立一个可以正常运行的金融市场。今天中国和其它一些国家的政治家们允许本国引入和扩张资本主义式的生产和投机，对于这些国家资本家们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要引进新的生产方式及相应的生活型式，就政治家们不得不在法制上建立并在政治上保卫各种市场存在的必要条件，包括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以及专业技术市场（专业人员的生活型式的必要条件）。

他们必须能够区分劳动力市场和专业技术市场在特色和结构特征上的区别，必须能清楚高薪的专业人员和称职的劳动力比起来到底多提供了什么。他们必须提出下面这些问题：有没有可能在这两种工作之间找到真正的区别？有两种员工吗？两者都是在赚工资，都为公司工作，都是按劳取酬。二者都不是公司的所有者，那么二者之间的区别到底在哪呢？

对于劳动力来说工资率决定了每小时的工资率。工资劳动者按照工作时长取薪，他在市场上出卖的是劳动时间。雇主有责任判定他的员工在每小时内创造多少价值。员工获得的工资由工资率决定，不能超过实际工时所对应的数额。员工可以说：“我生产的剩余价值多过你认定我能生产的。”但是决定他一个小时内的工作效率的责任不在他自己手上而在雇主手上。雇主有权力规划工作过程，管理和监督员工工作，也有权力不按照员工真正生产出的价值来支付薪水。雇主管理员工工作并占有其剩余价值的权力是与员工获得与其工时相对应的固定工资的权利相辅相成的。这是雇主和员工的相互对应关系。对于工资劳动者的生活型式而言，这种设置是所谓的“好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在工作时间之外他或她不用再操心如何能在工作场所更有效率。这是业余时间和休闲的基础。在业余时间你有你自己休闲或经营家庭生活的需要。业余时间意味着你的家庭没有必要每天晚上讨论农场或者商店或者公司怎么生存。你可以把工作抛在脑后而把精力放在对家人，对家庭生活或体育等事项的投入上。(Højrup 2003: 23ff, 32ff)。

有独立的业余时间工资劳动者生活型式结构中最核心的特点，这也是我所知道的文化历史里所有生活型式中唯一包含休闲这一概念的。其它我所知的生活型式并没有这种特定的结构特点。但是今天这已经是我们社会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因为这种生活型式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但在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其它生活型式中，我们发现这算不上是个特点。尽管如此，很多规划者认为他们在规划城市和地区的时候还是要当作所有人都把他们的每日生活区隔开来，分成工作和休闲这样两个相互独立的部分。对于人口中的其它群体来说，家庭生活、家族企业和与当地社区的融合才是其生活型式的核心特征。上面那种规划对他们就意义不大了。相反的，如果人们完全无法理解规划者的思路的话，这还可能给规划过程带来麻烦。对于专业人员来说这种工作和休闲之间的划分也无甚意义，甚至近乎于荒谬了。这个点可以拿来作为区分工资劳动者的生活型式与专业人员的生活型式的分界点。

在第一次做生活型式研究的时候，我们以为是职业导向的人所拥有的专业技术把工人的生活型式和专业人员的生活型式区分开来(Højrup 2003: 24f)。管理人员和研究人員等比常规工人的工资高是因为常规工人提供的专业技术更少，所以常规工作与管理工作在交换价值上的差异被认为是由于专业技术的成本和稀缺性高于劳动力（有技能或没有技能的）的成本和稀缺性。但是这时候我们就面临一个高多少以及这种高低程度的连续性的问题，这时专业技术就不能用来解释两种生活型式的显著差别了。需要技能的工作都包含着专业技术。因此我们必须能够说明在一个资本主义公司生产剩余价值和创造利润的过程中，专业技术是否具有某种特征能将其与和的劳动力显著区分出来。从民族学的角度去研究生产方式时，我们发现又一种（第三种）特定的实践在这种生产方式的变体中尤为必要，这就是以追求超额利润为目的，纯粹以投资的形式从一个公司转移到另一个公司的资本(Højrup 2003: 37ff, 144ff)。原因在于，如果一个公司在生产中不具备某些竞争者摸不透或学不了的优势，就很难避免竞争，而竞争会影响产品的市场价格，消减产品的剩余价值。然而如果你拥有竞争对手尚无的竞争优势，那么公司就可以创造剩余价值，并为投资者提供利润。资本主义公司通过优异的技术发明，特定的营销战略，新型的管理方式或产品创新可以在市场上创造出特定类型的短期垄断，这是其存在的必要条件。在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体中，纯粹投资者给养或取代了产业资本家的生活型式，构成其自身特定的生活型式。这种生活型式生产出独特的竞争优势。对需要生产出足够的剩余价值和利润以便从金融市场上的投资者手中吸引风险投资的单个公司来说，这种竞争优势举足轻重。所以公司渴望从专业人员身上获取的不仅仅是专业技术，而必须是独特的专业技术、经验、对策和创意。如果公司持续将最具独创性的人才投入到开发，探索和创造其最具竞争优势的愿景中去的话，竞争对手就无法得到该公司已拥有的这些资源。这些人才不是用工资就能聘来的，拿出利润中的一部分作为他们的收入

是必须的。如果他们得不到这部分的话，就很有可能被竞争者的猎头以他们无法拒绝的高薪挖角。

因此，专业人员与工资劳动者的生活型式中工作时间与业余时间的概念是不同的。对于后者来说工作与休闲是意识形态构成的基础。作为专业人员，你则把自己定位成生产独特创意和解决方案的人。但这时就有一个问题：一旦你独特的产品、工作方式或者解决方案被公司介绍、出售或使用，它就不是独属于你一个人的了。为了再生产你的生活型式你必须再生产自己的独特性，也就是你生产独特的创意和解决方案的能力。你凭借创意和解决方案得到的酬劳必须能转化成为自己用于再生产创造力的设备或条件，只有这样你才能不断的生产出新的创意和解决方案。其中一个方法就是要求公司提供一个工作条件，在这种条件下你可以保持自己的独创性上的领先地位。在公司中你必须不可取代。在后一种情况下，你的不可取代既是你实践的结果，也是你实践的基础。这种生存方式所具备的两个特征，即在独创性上的领先地位和不可取代性被称为是这种生活型式的“职业维度”。这两个特征的概念也是对于工作和休闲这种概念结构最大程度的否定。所以这两种生活型式不仅在逻辑关系上没有连续性，反而存在一种真实的差异和对比。专业人员的生活型式存在的可能性条件是一个对专业技术有需求的市场。很多人都知道这样一个市场的存在，当他们在周末查询足球俱乐部交易运动员的结果时，他们也明白这是资本主义的足球俱乐部之间对于独特创意和解决方案（的人才）之间的竞争。

市场对于独特专业技术的需求决定了你必须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创意和策略在被出售、商品化及应用之前不被他人抄袭。这一要求的法律前提是获得国家对于你的产品的专利保护。如果你被公司永久性的聘用，如担任管理人员、开发人员或研究人员这样的职务时，公司可以享受专利权，并且可以要求在条款中禁止专业人员在转而为其它公司工作后立即使用该项秘密（技术）。专利产品的法定地位和条款中的规定对于此类特定市场的重要性等同于在金融市场上保证合同有效性的司法系统。

从生存方式的浮动变化去考察资本主义的生活型式，这一角度为探索我们所说的“*时间性的悖论*”开辟了新的思路。“*时间性的悖论*”集合了一组复杂的研究问题。这些问题考察竞争中的相互斗争，也即同一市场上由

利润驱动并相互竞争的公司之间的关系(Højrup 2003: 32-41)。这种已经超越竞争本身的特定竞争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被推导和归纳为逻辑统一的陈述，以便在生活型式的民族志中对它们进行经验主义的验证。这一系列的陈述可以被简单的概括为：在特定的竞争概念的统摄下，一个公司的资源战略性的集中，用于获取自身的优势地位以及对抗对手施加的各种阻挠。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资本主义公司的商业存在形式的根基在于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的战略联合（配置的最优化）。这意味着对此目标没有助益的生产方式，专业人员的创意或者是劳动力应该被剔除，因为它们对于战略目标的实现来说已是负担。这一切如要发生，则所有的组成部分都必须从市场中获得（如交易，劳动力，独特的专业技术和资本）。然而，这些要素在对公司目标实现没有价值的时候，又必须都能够返还到各自相对应的市场中去。从这种市场互补的角度去看，只有在公司的资源配置可以充分利用相关的生活型式它们来进行价值生产，使它们可凭借其业绩得到相对于竞争对手的公司更好或至少相等的薪酬待遇、工作条件和利润时，这些生活型式才能在该公司存在下去(Højrup 2003:144f)。这一观点认为生活型式的诸多特征在逻辑上互相预设，而且因为具有概念和内涵上潜在的一致性而可以对其加以研究。我们可以对它们的可能性，概念的阐述和修正进行经验性的探索和验证。

验证的目的在于为以下的推断提供一个合理的基础，对陈述之间的统一性进行经验性的研究：为了在商战中打败竞争者，公司需要在其综合资源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建立强有力的，战略性的相互链接。在这种情况下各部分资源在公司的存在也是短暂的，因为它们随时可以转移到竞争者的公司中去。公司说到底就是一个暂时性的战略组织。因此，从逻辑上讲，公司的存在方式取决于它是否长于战略性的调配，从而比竞争对手从同样的资源（分别是工资劳动者、管理者和投资者的生活型式）中获取更多。从整体上来说，各不

相同的生活型式经常从一个公司流向另一个。新公司产生，旧公司解体，而在这复杂的流动中这些相关的生活型式又在时间的辩证法中不断互相塑造着对方存在的必要条件。

在这种逻辑下我们必须问这样一个问题：这三种特定的生活型式是不是把公司当作一种手段，而只在很少的例外情况下才把公司当作目的本身？只要身为公司的一员，专业人员和投资者的生活型式总是承担着确立和发展公司的手段和目标的任務。换句话说，他们以公司为手段，因为公司也依靠他们来设定战略目标---公司以商业蓝图来构建自身身份。探究和解释这种辩证关系很重要，因为它构成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生产-文化悖论，而这一悖论正是创新的基础。更进一步，我们要考察这是否是三种生活型式之间形成互补关系的关键---这里关系指的是它们修订后的概念之间的关系。对于这个关系的探讨在经验中变得非常重要，因为国家机器在过去的30年中似乎从专业人员的生活型式中吸收了很多重要的特征。有观点认为由于国家系统中的新挑战，这些新特征被广泛的表述为“新公共管理”和“竞争型国家”。

为了应对全球化和欧洲化，国家机构的公务员通过加强（在议会中就政府政策、法案提出的）质询、投资国家管理下的基础设施以及直接为公司提供便利来保证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联盟公司的增长条件。这也意味着我们一方面必须弄清行政部门的作用；它驱逐和舍弃国内失败的战略和生产者，为私有公司创造和维持其存在的必要条件，使得私有公司在市场中得以发展其时间辩证法，获得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我们还要探明国家机器如何管理“时间性悖论”的互补作用，也就是如何应对下列现象：寻求增长的国内公司被国外收购或是公司转向海外以求在第三世界国家获得更加便宜的同类生活型式。对于一国的公务员来说，主权领域内的经济增长是核心，而公司及其总部的对外转移是长期问题。因此，国家公务员的生活型式看起来既同由时间辩证法构成的市场中生活型式的流动相关，又构成对比。

正如之前提到过的，（生物学中的）自然生命形式由生态系统中的新陈代谢关系决定，换句话说就是食物链；而（民族学中的）文化生活型式则取决于劳动分工、劳动力占有及其特定的政治、法律和意识形态的先决条件。不同的生活型式向一个共同的过程---社会构成---提供不同的贡献。另外一个将文化生活型式同生物学的生命形式区分开来的特征是每一个生活型式都指向其特有的文化概念系统，这些系统是其特定的意识形态、世界观和日常生活的概念体系的基础。这就意味着你可以立足于自己的生活型式所对应的特定的意识形态中去观看你周围其他的生活型式，但是在观看之前你已经戴上了有色眼镜，这个颜色是你自己的生活型式所赋予你的，不是其它生活型式的人在观看自己的生活时的意识形态染色的，也不可能由独立于自身生活型式之外的独立概念来赋予其颜色。正因为如此，想要意识到在自己的生活型式之外还存在其它的生活型式是困难的，也就是说整个关于生活型式的讨论听起来都像无稽之谈。这种对于其它生活型式的盲目性是生活型式之间相互关系的一个重要特征。文化差异本身就指向着对于这种差异的盲目性(Højrup 2003: 125f, 61ff)。这种结构性的盲目和意识形态关系上的无知被称为“生活型式中心主义”。只有借助民族学的概念体系才能突破这种屏障，才有可能探索不同的生活型式如何互为基础，互相预设，但在互相观看的同时又无法摆脱“生活型式中心主义”的有色眼镜。在不同生活型式的相互关系中，它们之间的相互依赖以及“生活型式中心主义”是相互呼应着的。因此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要描述和解释生活型式中心主义是如何展开，运作的，比如它是如何影响规划过程和决定政治进程的等等。

我可以举几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我们语言中的一些词语，尽管它们的意思看似普遍，但其实对于不同生活型式的拥有者来说具有全然不同的意义。对于专业人员来说，“工作”就是生活，对于工资劳动者来说“工作”是为了谋生，而对于个体经营者来说你为了“工作”而活。许多被我们当作一般性的词语其实暗含着生活型式主义。我们都知道自由是什么意思，也认为大家对它的内涵存在共识。但是自由对于不同的生活型式的人而言具有不同的意义。在个体经营者的生活型式中，自由意味着成为一个独立的生产者，如独立的家庭农场的农民或是个体户渔民。对于工资劳动者来说，自由意味着在你不用工作的时候得到的自由时间，这是与工作时间相对应的。对于专业人员来说，自由意味着你可以开创自己的事业，展现自己的创意，为了职

业上的成功生产出独特的创意和解决方案。自由不代表对于公司的所有权，而是在其它公司为你提供更好的机遇去发展自己在独特性上的领先和不可替代的地位时你有自由离开原公司。对于公务员的生活型式来说，自由是指独立于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之外，作为一个长期公务人员，为国家、地区乃至地方当局的普遍利益做出贡献。

从专业人员的角度来看，工资劳动者偏爱那些无需提高自身素质、力求上进的工作，这是对自己时间的浪费。他们认识这些人，因为在他们还是学生的时候他们也必须做同类工作来挣钱，而且在公司里的层级中很多人都在最低层，做着这类工作。所以他们其实很了解这些人(Højrup 2003: 37)。他们对于自己所见识到这些人的理解就是他们懒惰倦怠，因为他们的能力和所受到的教育有限---不是因为他们来自于不同的生活型式并因此对“过好日子”具有不同的理解。反之，从工资劳动者的角度来看，他们中的大部分也对专业人员比较熟悉，所以知道他们一直在工作，以至于无法兼顾家庭生活。当专业人员们把小孩抱在怀里的时候，心里却总在惦记着其它一些奇怪的事情。即使他们在思考的是新的创意和市场，如何打败竞争者，怎么创造领先地位，怎么以新的方式做到不可取代，工资劳动者是看不出来这些的---能看得出来的就是这个爸爸对他怀中的女儿心不在焉。通常工资劳动者会觉得专业人员不过是在早期为老板打了江山的人，所以现在可以坐享其成，开上好车等等(Højrup 2003: 36, Højrup 1989)。

我们也可以尝试描绘一下上述两种是怎么看待个体经营者的生活型式的(Højrup 2003: 34)。个体经营者常常是作为同事或店主这两种角色而为人认识。他们会成为公司里面的同事是因为这些人常常要打另一份工来贴补自己从农场或店里获得的收入；在这种情况下，工资劳动者常常会把他们的同事在家里的活计想像得很浪漫，觉得是一种休闲而美好的田园生活。而当同事是店主时，又会觉得他们不是胼手胝足、劳碌不休，就是狡猾奸诈、唯利是图。反之，在拥有个体经营者生活型式的人看来，工资劳动者都是太闲太懒，所以没办法摆脱对雇主的依赖为自己打工。

凭借这种分析模式，我们便可以研究不同生活型式的人们是如何从自身特定的概念体系出发去看待彼此的。对于规划者来说他们的问题是要创造出一个共同的计划，并不只为某一个特定的生活型式服务。不管是国家、地区还是地方当局的规划过程都应该能做到这一点(Højrup 2010)。在规划中你必须能够对于利益不同甚至相背的生活型式进行反思，因为你必须保证不同的生活型式得以维系其特定的存在条件。这是政治进程和规划进程必须顾虑到的。但是我们也可以站到另一面上发问：为什么我们必须保护这些生活型式的存在条件呢？答案是因为国家和社会依赖于它们。但为什么国家，或者说是政府依赖于社会中不同的生活型式呢？因为生活型式关系着一国是否可以捍卫对其主权领土的承认。国家必须要求其周边其它国家承认它的主权(Højrup 2003: 172ff)。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不仅保持内在和谐很重要，维护国内生活型式的存在条件也很关键。要想做到后面这一点，国家就必须获得对其主权的承认，保证其边界不受其他国家侵犯。必要的统治工作和对外政策也对一国国内的生活型式提出要求。国家必须能够生产出保卫其主权领域所必需的资源和能力。

这些要求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时时变动的。国家系统总在变化；国家面临的机遇和威胁也从无定数。因此国家常常需要引入一些新的生活型式并且淘汰掉一些旧的。比如说：为什么两百年前欧洲要把封建农民的生活型式转化为家庭农场的生活型式？因为在拿破仑的一系列战争中市民组成的步兵团显示出充分的军事优越性，国家不能再把国防任务寄托在从封建农民中征来士兵身上，所以土地改革在此时就变得必要起来。欧洲国家必须要改善新农民的条件，对于他们来说土地的所有权非常重要，为了捍卫这个权力他们不吝于为国捐躯(Højrup 2003: 211ff)。再举一个例子：为什么冷战后的俄罗斯要在俄国的社会构成中引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应的生活型式？因为俄罗斯要在中欧的铁幕落下之后与西方的经济体竞争，这时就必须引入产业资本家、投资者、专业人员和个体经营者的生活型式以改善俄国的市场经济。当时西伯利亚有过去的驯鹿牧民和佃农，俄罗斯平原有家庭农场的农民，中欧地区有许多规模不大的雇农群体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



只是作为私营家庭经济的补充，甚至只存在于黑市上。他们已经在那里了，只是需要扩展他们存在的可能性条件就可以了。与此同时，俄国开始为引入投资者去积极创造可能性条件。投资者们当时获得了购买苏联的大型集体农庄、集体经济和产业并将其改造为资本主义公司的机会。他们从官僚主义的国家机器中调出一批人充当新的专业人员，这些人必须彻头彻尾的改变自己的生活才能在新的市场中存活下来，获得具有竞争优势的专业技术和独特性上的领先地位。我们在俄罗斯发表的第二本关于生活型式的书讨论的是专业人员的生活型式以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Hansen & Højrup 2000)。自从恰亚诺夫和列宁以降，俄国的研究者们对于雇农和农场主的生活型式已经了如指掌了，但专业人员的生活型式以及自由市场对于独特性上的领先地位的需求，虽然是必要而核心的部分，却仍然由于太新而尚未被纳入旧有的国家计划经济中。

把这些生活型式的可能性条件引入今日中国对于社会结构的转型来说很重要。旧式欧洲简单化的及进化论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旧的生产方式总是在一个非线型的文化历史中不断被新的生产方式取代。原始的共产主义先后被奴隶制、封建制及资本主义取代，并且最终将达到高级的共产主义。但是，正如生态系统的理论关键在于复杂的转型，社会结构的理论也必须转化为一个复杂的自我不断超越的过程。这种理论要求我们必须理解国家体系概念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将其做为社会结构概念根本的可能性条件。我们必须揭示国家如何在争取承认的过程中铸就，以及这个过程对于国家内部结构中新旧生活型式的代谢的重要性。受克劳德·伯纳德的启发，我们可以把这个过程的总体结构描述为国家内部环境和国家体系外部环境之间必要的概念关系，以此来表现其复杂性(Højrup 2003: 221ff, Hirst 1975)。这两个层面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充分理解国家体系转型过程复杂性的先决条件。正如有机体的内外环境之间的关系是高级生物学理论中自然历史里适者生存过程的核心，任何一个国家系统内外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是高级民族学理论中在文化历史里国防强则国家存这个复杂过程的关键。

这个介绍的最后一部分将介绍怎么借助这种双层分析来描述整个二十世纪丹麦社会构成的关键特征的转型，并解释国家形式的构成和生活型式分析本身何以是这种转型过程中相对自主的部分。

## 对一个复杂的转型及概念创造过程的具体描述

从19世纪中期开始，丹麦在欧洲国家体系中维持中立策略，同时它对于英国市场的农业出口不断增长。在此基础上丹麦的福利国家体系发展起来。国家有意识的加强管理以改善一些具有战略决定意义的领域，这些领域里的小个体户生产商需要巨大的优势和独创性才能应对现代欧洲资本主义竞争者的冲击。国家的支持主要表现为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使得农业和渔业的从业者有了选择，不必受制于大型外国公司的运输量，不然的话这些外国公司势必利用其资产密集及规模优势排挤丹麦的家庭经营和集体渔户<sup>4</sup>。由于国家对于港口，铁路，桥梁，河道和公路系统的建设，丹麦的生产商们尽管距离欧洲工业城市的市场相对较远，却依然能够把新鲜优质的食品和价值提供出去，从而获得直接、共同的竞争机遇，而这种优势对于一般的私营企业来说是需要付出特别巨大的资本才能与之抗衡的(Højrup 2010)。

与此同时，席卷欧洲的合作化运动在丹麦国内遇到一股重要力量的支持，这股力量把哪怕是小生产商手下各自不同的农业活动也统召在国家的生产链之下，它把个体经营的农业人口的勤勉精神和独立理想注入了融合与发展资本密集和规模优势的实践中。在乳制品和肉食品产业，出口协会，电力系统所有新兴

---

<sup>4</sup> 这里的集体渔户在英文原文中是“share organized fishermen”，是作者对丹麦语中 partsfisker 所作的翻译，partsfisker 指的这样一群渔夫，他们合伙捕捞，所得的共同收入用来支付生产资料的成本和生产过程中涉及的费用（包括渔船、渔网、绞车、柴油、清洁、包装等等），剩下的收入根据渔人的资历（船长，一级员工和二级员工）进行分配。在收成不好的时候，合伙人要共同承担经济损失。

领域中，为农村与城市合作建立共同系统以及合作经营的举措被证明是可行而且有益的。

出口收入，总支出水平与维持丹麦 20 世纪初逐渐在英德两国市场上形成的竞争优势息息相关。这意味着通过谈判推动国家的持续妥协，使其提供---对全国整体而言----富有竞争优势收入分配符合各种生活型式的利益。在简单商品生产者组成的合作社和丹麦劳动力市场模式间形成了内在的统一性，经济责任通过发展这种统一性得以建立。

同一些南欧福利国家的福利文化中由国家法律直接调控劳动力市场不同，丹麦的劳工组织具有描述、统一和代表其成员特定利益的权利。丹麦劳动力市场模式在对这种权利承认的基础上得以形成，在法律的权力下这种模式相对来说拥有更多的自主权(Jul Nielsen 2002)。本着互利的原则，劳动力市场上的合作社的团体、劳工组织及党派都有义务求同存异，淡化和消解自身对于公共政策的不满，否则在困难时期这种不满容易演变成他们之间的冲突和社会暴动。为了求得一个灵活自由的劳动市场和合作社型社会，使得工资劳动者能按照经济周期被聘用和解雇，每个公司都能承担起责任，根据市场条件安排其生产和再生产的成本，国家要提供的服务就是通过整整一个世纪以来党派及各种活动推动下的社会改革、教育改革和医疗改革来不断完善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制度和教育体系(Højrup&Bolvig 2007)。

正是沿着这条道路，丹麦在 19 世纪晚期实施了一套和纯粹的资本主义不同的工业发展战略。这个战略的根本就是创造了一条由家庭控股和产业组成的价值链，旨在向世界市场上作为资本主义发源地的国家出口食品。这条出口链的第一环是在农场里占主导地位的个体农业人口、小型农场主以及船队里集体渔户的生产，主要由创新产业，集镇和港口来为渔业和农业供应所需的机器和工具，由当地的工匠提供安装和建造等服务。合作社和私营的有限公司一方面竞争成为能源、饲料、化肥和其它养料的供应者，一方面竞争加工和出口产出食品的机会。国家的船运公司和当地木制帆船的领头人们把化肥、煤、建材、谷物和其它产品从港口和其它靠岸点运出来。码头上修建了越来越多的钢制海船。地区铁路公司铺就了分支线路来运输产品和乘客。集镇和地方行政区竭尽全力发展本地或利用异地最有利的基建项目和交通线路。不论是国家还是地方银行，储蓄机构还是信贷机构----为了保障生活型式的特定利益而建立起来的----都向这五大部门借钱，而国家、地方市县则发展和维护总体的基础设施建设，以保证出口贸易的集体性的规模效应，从而在欧洲市场上更有竞争力。

国会中的执政党、自由党、社会自由党、社会民主党和保守党在一个彻底的组织化、合作化的工业社会中----从地方选区和国家议会各层面----各自代表着他们自己的生活型式。这里的组织化是指劳动力市场的模式，包含着经济平衡，价格标准和薪酬待遇，三者被协调组织，以使丹麦的价值链在一个混乱而充满风险的世界市场中保持竞争优势。当这种组织化达到以一国（丹麦）为单位来组织生活型式的时候就可以算是组织化的高级阶段了。丹麦有大型的农业协会组织，有家庭经营和个体农民乃至乡村地区的民间高等学校组成的合作社协会，以及港口和小型码头组成的渔业协会。工人运动在集镇和首都创造了形形色色的社团，包括俱乐部、工会、政治团体和房屋协会，还包括夜校、媒体、出版社和合作公司。就像银行、商贸和法律从业者中的头目建立自己的社团一样，不论是能工巧匠还是人民公仆，大家都有自己的组织和社团。除此之外，家庭主妇们还建立了她们自己的主妇和家政协会，其中还包括她们自己的培训学校，受国家严密监督。

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正是由丹麦，这个多种生活型式被区分和统一的国家，来处理合作化和工业化社会中诸多领域的社会事务和组织事宜，而处理的前提是承认完全不同的生活型式在人口中的存在。

从合作化时期直到 1950 年代，丹麦经济 80%来自于农业出口。农民们生产牛奶、猪肉和鸡蛋，合伙制公司加工出黄油、奶酪、培根和鸡蛋，供给英国人作早餐。铁路和航运公司把加工产品运往英国。出口收入一部分用来购买煤炭和发电站的机器，一部分用来供给为农业提供化肥和机械以及将产品加工为出口成品

的企业。从广义上说，这是二战之后丹麦经济的主要组织形式，其根本特征在于两种截然不同的生产方式，各自对应着互不相同且根深蒂固的生活型式。第一种生产方式对应的生活型式包括家庭经营、能工巧匠和个体经营者的各种变体，另一种生产方式对应的生活型式则包括产业投资者、生产资本家、专业人员和工资劳动者的生活型式。从经验的角度来看，简单商品生产模式在农村占主导地位，与庄园、集镇和首都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并存，都由总部在哥本哈根的公务员的生活型式所管辖，而自治权也交给在城市当地的官方公共管理机构的公务员以及农村中当地地方行政区行政机构中的团体。

在整个 20 世纪下半期，用以组织合作化工业社会的生活型式常常被拿来同另一种与食品制造业全然不同的事物联系甚至对立起来，对于这个事物最准确的描述或许是“产业服务型社会”，它拥有一个福利国家的结构，国家的基本逻辑是资本主义的产业形式和经济增长模式，公民权利和实践应（通过公共机构）被调控以促进增长(Højrup&Bolving 2008)。

二战之后，丹麦决定调整其生存策略，从中立的主权国家转变为美国领导的西方联盟中的武装成员。由此，丹麦追随其它西方欧洲国家进入到一个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中来。这里的国家不允许使用限制性的商业政策或使用关税来保护本国最重要的生活型式。为了使西方经济保持增长，美国强制其欧洲同盟实行经济自由化，否则它们就无法从马歇尔系统中得到美元。欧洲国家通过经济自由化来自我调整以适应国际竞争，作为补偿，它们可以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将自己的货币与美元挂钩。欧洲国家由此避免了史上最恶劣的货币价值的浮动。尽管如此，它们必须在一个开放的世界市场上运作，此时能存活下来的生活型式是那些能找到细分市场，并且在该市场拥有足够竞争优势的。因此，这些欧洲国家不得不寻求崭新的发菜战略，而非过去那些保护农业、手工业、合作社工业和工人运动等生活型式的策略。对于服务于公众的首席经济学家们来说，他们的对策就是创造一种“现代人口”，他们能够终其一生不断自我调整，以适应经济增长和持续的结构优化。(Højrup 2002, 2003a, Buus 2001, 2002)

战后政府和公务员们建立丹麦福利国家，公共机构得以大幅扩张，在这样的背景下，关于世界的话语和文化图景中经济增长依然永远是首要目标和最重要的驱动力。政客和公务人员认为这股动力会打破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生活的组织形式，并且由于迅速的结构性转变要示越来越多甚至是终生性的个人的自我调整，这股动力也会将个人推向焦点的位置。

正如前文所说的，最早的生活型式分析始于上世纪 70 年代末期，当时的观念认为丹麦人口内部根本性的文化差异已经解体，并且为“幸福生活”的统一模式所替代，生活型式分析的目的就是为了说明并质疑这一观念。事实证明，合作化的工业社会中组织有序的生活型式在表面之下仍然是构成农村和集镇地区的文化基础。普适性的福利国家制度发展得并不到位，而且单一文化的政治意识形态也与生活型式相冲突，但是它们并未消失----在整整一个世纪中它们被组织与发展着，对于民族学家来说对它们进行理论和实践上的纪录和研究是可能的。

这项研究推进了概念发展，并且对于 20 世纪占主导地位的生活型式进行了描述，这为此后四十多年从民族学角度对生活型式的形态和变迁进行的研究奠定了概念基础。对于个体户、工资劳动者、专业人员、投资者、家庭主妇等生活型式最早的概念化是建立在生产方式理论和 1970 年代的日常生活理论的基础上的，深受这两种理论的影响。当时调整和重塑现存的生活型式，以便建立自由主义的世界经济，对抗二战后的东方势力是当务之急，建立广泛意义上的福利国家则还在其次。因此在十后冷战结束时，这些设置都面临着急剧的变化，而普适性的福利国家形式也失去了其作为丹麦对抗苏联意识形态威胁的防御模式的功能(Højrup 2003a, Jul Nielsen 2004)。

1980 年代针对冷战威慑主义的理论斗争成为一股重要的动力，推动着对于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成理论的

根本性的修正，而这两个理论正是生活型式的概念基础。国家系统的概念（即：为承认而斗争）取代了生产方式的概念，成为新概念形成的转折点。冷战的最大的特点就是超级强国试图取得压倒性的优势，当这种努力失败的时候，至少达到一种武力的制衡。这里关键的问题在于当时最理想的状态----即东西方之间所达到的某种平衡----会继续把国家系统建立在一种从本质上说脆弱的和平之上(Boserup&Niield 1990)。那么，把和平建立在国家间另类的战略关系上是否有其逻辑上的可能性？这个切实问题为以下两个问题的理论探讨提供了契机。第一个问题是：国家间互相承认的可能性条件；第二个是：坚固的（与脆弱的相对应）相互承认的关系系统的特定前提；当这个研究被应用于战略实践的时候，事实表明防御者的优势和进攻者的劣势----在“防御性国防”这个概念中达到了极致----对于创造平稳的和平局面至关重要。我们在 EUCIS（欧洲国际安全中心）研究中心的研究实践得出的结论是：国家概念的前提正是防御性战斗模式在根本上的优越性，这种模式又被总结为  $D>O$ （防御>进攻）。从逻辑上讲，正是防御的优越性将“为承认而斗争”分化成为相互承认的国家体系。 $D>O$  的体系中国家是具有自我意识的主体，并且能够保护各自的主权领土，即能够根据双方意愿设置限制（划定边界）。

于是在诸多国家组成的系统中，单个国家被其国防能力而定义。正是作为其国防能力的结果，国家在理论上由其所处的特定系统中的战争或停战情况而决定其范围。由于一国的国防能力取决于该国产生和更新其为特定生活型式提供可能性条件的内部环境的能力（它们提供国防能力和防御的意愿），国家的社会组成由国家系统（为承认而斗争）中特定的可能性条件决定。国家常常在“为了承认而斗争”的过程中形成，国家体系在理论上的形成可能是一个裂变的过程，而每个国家的统治权决定了特定的生产模式以及对于国家的国防力至关重要的生活型式的在政治、法律、意识形态和经济方面的可能性条件。对于统治权的占有欲成为探索国家系统不断自我超越的转型过程及其在政治、话语、经济和生活型式层面持续影响的民族学钥匙。(Højrup 2003: part 4). 正是基于同传统国家理论的分野，我们才开始对于文化历史发展理论，也即前文所述的“国防强则国家存”的民族学探讨。

后冷战国家系统中英美集团的主导地位日渐飘摇。在此基础上，新自由主义演变成了全球话语，而后管制的全面撤销先是创造了一个由金融驱动的经济体，而后引发了该经济体的崩溃。其表现形式是始于美国而殃及全球的次贷危机(Højrup&Juul Jensen 2010)。到这里，它演变成了一场对于生存方式有着深刻影响的经济危机。于此同时，亚洲国家，包括后来的金砖国家的经济增长及其对于世界市场中产品、服务和资本的把握也越来越高端，这引发了全世界所有国家内部生活型式条件真正的急速转型。在旧有的西方世界之外，大量新的生活型式正在其它国家形成。

在理论层面上，生活型式概念通过以上过程得以进一步发展，而且整个概念根基面临着认识论意义上的转折，这个转折源于对于“为承认而斗争”这一关键概念的重要发现，这个关键概念是生活型式理论的前提，但在被发掘之前一直处于未知状态，是其隐含的预设(Højrup 2002a, 2003)。在发现这一关键概念后，国家体系和国家的统治的相关工作才明确起来。作为决定特定国家形式下的生产方式的先决条件，它的地位是如此重要，为其它各种概念的纠正、说明和深入阐述确立了基础。它也为夯实今天对于生活型式概念及其存在条件的理论理解开辟了道路。在过去四十年中国家系统经历了根本性的转型，我们要研究那些塑造这些转型经验的必要条件的变化因素，它们在过去发挥作用，现在的作用仍在加强。今天一项重要的民族志的任务就是检验哪些变化预示着生活型式将要发生的变化，而生活型式的变化又会对这些变化因素发生什么影响。另外一项重要的民族学任务就是通过从经验上探索长期文化历史的演进来研究国家形式和生活型式之间的相互联系。

参考文献:

- Boserup, Anders & Robert Nield (eds.) 1990: *The Foundations of Defensive Defence*. Macmillan: London.
- Hirst, Paul 1975: *Durkheim, Bernard and Epistemology*. Routledge & Kegan Paul, London.
- Højrup, Thomas 1983: *The Concept of Life-Mode. A Form-Specifying Mode of Analysis Applied to Contemporary Western Europe*. *Ethnologia Scandinavica* 1983.
- Højrup, Thomas 1998: *Problemi gnoseologii, istorii kultur i teorii gosudarstva*. Knigoizdatelstvo VSEMIRNOJE SLOVO, Sankt Petersburg.
- Hansen, Kirsten Monrad & Thomas Højrup 2000: *Glavnoje otlitshie. Modelj zjizni sovremennogo menedzjera i nauka obnovlenija*. Knigoizdatelstvo VSEMIRNOJE SLOVO, Sankt Petersburg.
- Højrup, Thomas 2002a: *Ethnologie und Politik. Das aristotelische Erbe in den Kulturwissenschaften*. *Zeitschrift für Volkskunde* 2002/II.
- Højrup, Thomas 2003: *State, Culture and Life-Modes. The Foundations of life-Mode Analysis*. Ashgate, Aldershot.
- Højrup, Thomas 2010: *Del recuerdo a la experiencia. Herencia cultural y ambiente cultural en Dinamarca I: SphEra especial Publica*. *Revista de Ciencias Sociales y de la Comunicación. Patrimonio cultural. Nuevas formas de tratamiento/nuevos sentidos*, s. 119-165. Universidad Católica San Antonio, Murcia.
- Højrup, Thomas 2011: *The Need for common Goods for Coastal Communities*. Han Herred Havbaade, Slettestrand.
- Højrup, Thomas & Klaus Schriewer (ed.) 2012: *European Fisheries at a Tipping-Point*. edit.um, Murcia.
- Høst, Jeppe 2013: *Captains of Finance. An Inquiry into Market-based Fisheries Management*. Faculty of Humanities,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Copenhagen.
- Højrup, Thomas 2013: *Life-Mode Analysis – a Contextual Explanation*. In: Klaus Schriewer (ed.) 2013: *Perspectivas de las Ciencias Culturales*. Edit.um, Murcia

Danish texts:

- Buus, Henriette 2001: *Sundhedsplejerskeinstitutionens dannelse. En kulturteoretisk og kulturhistorisk analyse af velfærdsstatens embedsværk*. *Stats- og livsformer 2*, Museum Tusulanums Forlag, København.
- Buus, Henriette 2007: *Indretning og efterretning. Rockefeller Foundations indflydelse på den danske velfærdsstat 1920-1970*. *Stats- og livsformer 10*, Museum Tusulanums Forlag, København.
- Christensen, Lone Rahbek 1997: *Hver vore veje. Livsformer, familietyper og kvindeliv*. Museum Tusulanums Forlag, København.

13

- Højrup, Thomas 1983: *Det glemte folk. Livsformer og centraldirigering*. SBI, Hørsholm.
- Højrup, Thomas 1989: *Lønkapital under Folkestyre. ØD-planernes strukturfejl og deres ophævelse*. Rosinante & EUCIS, fra 2005 Museum Tusulanum, København.
- Højrup, Thomas 1995: *Omkring livsformsanalysens Udvikling*. *Stats- og livsformer 1*, Museum Tusulanums Forlag, København.
- Højrup, Thomas 2002: *Dannelsens dialektik. Etnologiske udfordringer til det glemte folk*. *Stats- og livsformer 4*, Museum Tusulanums Forlag, København.

- Højrup, Thomas 2003a: Livsformer og velfærdsstat ved en korsvej? Stats- og livsformer 5, Museum Tusulanums Forlag, København.
- Højrup, Thomas og Bolving, Klaus 2007 (red.): Velfærdssamfund – velfærdsstaters forsvarsform? Stats- og livsformer 8, Museum Tusulanums Forlag, København.
- Højrup, Thomas 2008: Om begreberne folk og kultur. I: Foreningen Danmarks Folkeminder Årbog 2008 Folk og Kultur. Foreningen Danmarks Folkeminder, København.
- Højrup, Thomas 2013: Kulturelle livsformer og helbred. I: Sundhed, menneske og samfund. SamfundsLitteratur, København.
- Højrup, Thomas & Juul Jensen, Uffe 2010: Moderne fællesgoder eller postmoderne kynisme? Mellem velfærdsstat og konkurrencestat i teori og praksis. In: Viden, virkning og virke – forslag til forståelser i sundhedspraksis, Thorgaard, Nissen og Juul Jensen (red.), Roskilde Universitetsforlag, Frederiksberg.
- Jespersen, Astrid, Marie Riegels, Marie Sandberg 2006: Verden Over. En introduktion til Stats- og livsformsteorien og dens aktuelle anvendelse i etnologien. Museum Tusulanums Forlag, København.
- Jul Nielsen, Niels 2002: Virksomhed og arbejderliv. Bånd, brudflader og bevidsthed på B&W 1850-1920. Stats- og livsformer, Museum Tusulanums Forlag, København.
- Jul Nielsen, Niels 2004: Mellem storpolitik og værkstedsgulv. Den danske arbejder – før, under og efter Den kolde krig. Stats- og livsformer 6, Museum Tusulanums Forlag, København.
- Økonomiministeriet 1995: Demokrati og åbenhed i pensionsinstitutternes Investeringsbeslutninger. Betænkning nr. 1306, København.